

上海东文学社与南洋公学的东文学堂

邹振环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日本在华影响的日益扩大，日语势力也渐渐膨胀，一些日本人主张在中国创办日语学堂，传授日本语取代原来英语系统以强化日本的在华的势力范围。如1900年辻武雄在《支那教育改革案》中提到，中国“以讲习日本语言为主脑，何则？日本、支那二国，由有邻邦之谊，同文之便，可以互相观摩。中学堂以上可以日本语为必修科，以英语为随意科。”1905年日人哈拉达发表《论日本在华教育势力》一文中声称：日本教习、日本留学生和日本教科书是日本在华的三大教育势力。¹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知识分子除了选择留学日本外，一部分开明士人和民间力量也参与了国内的日语教育的活动。1896年起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一批东文学堂，京沪两地在19世纪末有多家东文学社。²如1896年陈宝琛在福州乌石山创办了东文学堂，³被认为是“闽中社会学校之初祖，校之中经费，集绅捐者半，资日本同文会者半。校师皆延自日本。曰中西里太郎。曰桑田丰藏、曰森原道；校生习普通，习速成，有毕业游学东洋者，有为社会司译权者。庚子而后，新政合行，众措大学究，始渐渐输进其中。”⁴1897年有金陵东文学堂，1898年有杭州东文学堂、福州1898年东文学社（以后改名全闽师范学堂）；1899年有天津东文学堂、成都四川东文学堂、苏州东文学堂、南京“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也曾开设“东文学堂”。1900年有厦门东亚书院、南京同文书院；1901年四川总督奎俊接受日本大尉井户川辰三的建议，由周善培考选学生20名带赴日本留学，在日聘用一日本教习回川，于成都开设私立东文学堂。1902年四川学政吴郁生在成都也创办东文学堂，以为学生补习日语和作出国准备。

在上海日语教育方面最有成就的东文学堂是1898年成立的东文学社和1901年南洋公学所设的东文学堂。本文主要讨论这两所材料比较集中的、特点比较明显的东文学堂日文

¹ 齐红深主编《日本侵华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5~56页。

² 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册，第六编“学术编年”将京、沪两地的东文学社混为一谈。（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14页）

³ 该学堂1903年秋改为师范学堂，民国年间为省立福州高中；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国立编译馆1935年，第6页。

⁴ 参见《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8日第2号。

教学的成效与影响，着重分析王国维、樊炳清、丁福保等毕业生的日文学习及其翻译业绩。

一、上海东文学社与王国维的外文学习

第一家有相当影响的专业日文学堂是上海的东文学社。该校是1898年农历正月由吴县蒋黻（伯斧）、溧阳狄葆贤、钱塘汪康年、山阳邱宪、上虞罗振玉同创的。⁵社址初在新马路梅福里（今黄河路凤阳路口）农学报馆对门萃报馆内。1898年2月26日（夏历二月初六）正式开学。⁶创设宗旨：“日本同处一洲，而研习其语言文字者顾寥寥焉。彼都认识莅止中国，中国士夫往往不能与通姓字，彼国书籍流传中国，中国士夫往往不能通数行。不便孰甚。蒙等不揣固陋，创立学社以为之倡，但见闻浅陋，资力未充，尚冀同仁襄成此举。”计划先在上海，将来渐渐扩充至全国各地。主旨当然是“培养通晓日文、日语人才及翻译日文书报人员。”⁷初创的计划显然是为了给中国培养更多的翻译外国农书的人才。但管理一所近代新式日文学堂，罗振玉等是缺乏经验的。于是他和汪康年商量：“东文学社事，或由公径与藤公妥商，总以学社独立，不为农会附庸，一切由藤公主持为妥，缘藤公一片热心，不宜加以限制他。”⁸实际上是把该校的管理大权交给了藤田丰八。

藤田丰八（1869—1929），号剑峰，1869年出生于日本德岛县美马町郡里村，1892年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文学科，1895年毕业后入大学院专攻“支那哲学史”，曾与田冈岭云等共同发行《东亚说林》。1897年夏至上海，受聘于上海农学会担任日文翻译。在《农学报》上发表译文多达420篇。1900年东文学社停办而一度回国。1901年再次受罗振玉聘请来华出任南洋公学附属东文学堂教习、《教育世界》编辑顾问，还曾随罗振玉任江苏师范堂教习、两粤高等教育顾问、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总教习等。1911年回国，1919年后历任早稻田大学教授、东京大学教授。著有《支那文学史》、《先秦文学史》、《东西交涉史研究》等。⁹罗振玉在《集蓼编》中称：“藤田剑峰学士，性伉直诚挚，久处，交谊日深。一日，予与言中日唇齿之邦，宜相亲善，以御西力之东渐。学时极契予言，谓谋两国之亲善，当自士大夫始。于是日本学者之游中土者，必为介绍，然苦语言不通，乃谋创立东文

⁵ 《东文学社社章》，载《农学丛书》第一集第二册；参见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2页。

⁶ 1898年3月1日王国维致许同菴，载刘寅生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3页；1898年3月10日“社中开学宴客”，郑孝胥“缴帖而去”。（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二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646页。）

⁷ 《东文学社社章》，载《农学丛书》第一集第二册。

⁸ 《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22~224页。

⁹ 参见[日]内田庆市《近代东西语言文化的接触》，关西大学文学部2001年，第312~314页；吕顺长著《清末浙江与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02~203页。

学社，以东文授诸科学。”黄孝可在《藤田博士小传》中也说：“三十岁在上海，与罗振玉共创东文学社，以日文教授科学，翻译日本新刊书记，为清末新学勃兴之先驱。”¹⁰开始规定募收学生40人以内，年龄自15至30岁，必须精通中文，修业三年，每年学费20元，毕业后由学社推荐任学校或报馆的翻译。是年夏天招生，学生满额，教员不足，于是藤田丰八便聘请他的大学时代的知友田冈岭云（又名佐代治）来沪帮忙。同时，上海日本总领事馆副领事诸井六郎、书记船津辰一郎都欣然充当义务教员。课程以日文、日语为中心，除此之外，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也都兼授，¹¹就课程设置的规模和合理的师资配备而言，我以为该东文学社在当时中国众多日语学堂中堪称首屈一指。

戊戌变法失败后，胆小的出资者蒋伯斧和管理校务的邱于藩先后离开，学生也多中途辍学。罗振玉在刘坤一的支持下，勉力维持。罗振玉在《集蓼编》中这样写道：“学社创于戊戌仲夏，及八月，政变发生，校费无出，……生徒散者三之一，而高材生若海宁王忠憲公，山阴樊少泉（炳清），桐乡沈昕伯（紘）两文学，均笃学力行，拔于俦类之中，不忍令其中辍，乃复由予举私债充校费。幸一年后社中所授史、地、理、化各教科，由王、樊诸君译成国文，复由予措资付印，销行甚畅，社用赖以不匮。”¹²1899年东文学社就学人数渐渐增加，原社址地隘不能容，于是迁到制造局前的桂墅里。¹³从当时的“东文学社告白”中得知，开设近一年的东文学社，其学生“头、二班已能译书，成效昭著”，正准备“添招三班三十人，以期推广”。¹⁴藤田丰八、田岗佐代治都是文学学士，主攻哲学，但在该校也教数学等课程，他们教学严肃认真，教学效果还是不错的。¹⁵

东文学社社章中规定，如果学生贫苦不能出修金者，经保人担保，亦可来学习，但将来学成，一定要在该社中担任翻译，以资酬学费。学社培养出不少知名的学生，如吴尔昌、胡浚康、萨端、陈贻范等，后来成为金城银行董事长的周作民，15岁时入东文学堂（社）读书，师从罗振玉。1902年前往广东，进入广东公学，学费也是由罗振玉资助的。后以优异成绩考取广东官费留学日本，进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¹⁶在该校学生中，罗振玉提及的最

¹⁰ 转引自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页。

¹¹ [日]伊原泽周《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研》，中华书局2003年，第280页。

¹² 转引自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页。

¹³ 参见《庭闻忆略》，罗继祖《蜉寄留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0页。

¹⁴ 《中外日报》1899年1月15日。

¹⁵ 张连科《王国维与罗振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页。

¹⁶ 顾桂林《周作民》，载徐矛等主编《中国十银行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64页；参见完颜绍元《爱国金融家周作民》，载熊尚厚主编《民国著名人物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480~481页。

优秀的三位，即王国维、沈紘¹⁷与樊炳清。

1898年2月22岁的王国维进入《时务报》报馆任书记，经汪康年的同意，以每天午后3个小时到刚刚成立仅有6名学生的东文学社学习日文。由于报馆事务繁杂，自修时间不足，入学半年后考试成绩不及格。为此王国维深感苦恼，他在1898年3月24日给友人许同藴的信中称：“读东文颇觉不易，苦无记性，不能从事他学，又不能半途而废，殊闷。”4月3日又写道：“现在弟学东文，势难间断，已成骑虎之势，……现在除东文三点钟外，几无暇晷，于学问丝毫无益。”¹⁸按规定学生不及格者应该退学，王国维又是一个“口讷而不善辩论，于人世一切酬应都不当行”的人，但罗振玉慧眼识才，仍准许他继续学业，不令辍学。¹⁹藤田丰八还专门向汪康年提出，给予王国维以更多的学习时间。很快王国维就入了门，8月5日他在给许同藴的信中称：“东文较西文难易迥别，但须取中、东虚字列成一表（须东人优于中文者为之），则读其书甚易。弟于此事甚浅（同社六人，惟弟最劣），果能专精事此，一年当能通之。”不久他已经能翻译日本书籍报纸，10月23日，他在致许同藴的信中称自己“日约可译千余字，较作文颇不费心也。”²⁰同年9月维新变法失败，《时务报》关闭，罗振玉遂聘用王国维为庶务一职，而免除其学习期间的一切费用，还请他参与《农学报》的编译工作，担当史、地、理、化各类教科书的编译。这是他后来能顺利进入东京物理学校留学的基础。1899年秋，罗振玉还提升他担任东文学社的学监，但不久王国维因与学生不和而放弃了职务，但罗仍致月俸如在职。²¹期间，王国维有机会从该社助教田冈佐代治研究哲学。田氏文集中引用了康德、叔本华的哲学，深深吸引了王国维，王国维后来还随其学习英语，在东文学社前后学了一年半的英文。不仅用日语为农学社翻译了不少农学书刊，编入“农学丛书”，而且还译出不少西方哲学，如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的作品，发表在《教育世界》杂志上。有影响的译著有日本文学博士桑木严翼的《哲学概论》、元良勇次郎著《心理学》、《伦理学》；日本理科大学教授理学博士饭岛魁编《动物学》等，对近代思想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此时王国维对德国的哲学家康德、尼采、叔本华的哲学有极大的兴趣，而“从日文本翻译品入手，未能饫其欲。乃进一步学德文，作为金钥

¹⁷ 沈承怿（？——1918），改名紘，字忻伯，一字忻伯，廪生。浙江桐乡人，出生在炉头镇。他曾为《农学报》和“农学丛书”译出过大量的作品，后由两广总督岑春煊派往法国留学，在法前后逗留了14年，获法学博士和理学博士。欧战事起，无法回国，1918年病逝于巴黎。参见民国《乌青镇志》卷十四，此一材料系桐乡方志办的俞尚曦先生提供的，特此致谢！参见《庭闻忆略》，罗继祖《蜉寄留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0页。

¹⁸ 吴泽主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页 。

¹⁹ 《庭闻忆略》，罗继祖《蜉寄留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54页。

²⁰ 吴泽主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页 。

²¹ 王庆祥《罗振玉和王国维交往始末》，载《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667~668页。

匙。”但德文“为一艰涩语言，而哲学又为抽象学说，直接读原文，不易通其义。读翻译本，又不能观其全，于是大困。”²²辛亥革命后王国维与罗振玉到日本，日本学者神田称：“王先生会一点日语，有时当罗先生的翻译，可是不太流畅而且口吃，不太好懂。”²³虽然，王国维在东文学社没有学好德文，即使日语也不是特别出色，但藤田丰八对王国维评价“极高”，他对日本汉学家狩野直喜说他教的学生王国维“头脑极明晰，善读日本文，英语程度也很高，而且对研究西洋哲学有兴趣，他的前途真是引人注目。”²⁴

二、樊炳清与《东洋史要》

1899年东文学社除招收学生学习日语外，还出版过该学堂学生翻译的若干译著。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樊炳清译出的日本桑原骘藏著《东洋史要》。樊少泉(1877——？)，字炳清，又字抗甫、抗父，浙江山阴人，茂才。曾同罗振玉一起赴武昌农校任翻译。1901年辑有《科学丛书》，由教育世界出版所出版。期间为南洋公学译书院译出日本陆军省编辑的《步兵工作教范》。1903年译出日本矢津昌永的《万国地志》，1903年由成都志吉堂出版。民国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先后编有多种教科书，如1921年与庄俞编有《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1922年与沈颐、庄俞编有《高等小学女子新国文》。除为《农学报》翻译大量作品外，他还译有《东洋史要》、《西洋史要》等历史教科书；《伦理学教科书》、《近世博物学教科书》、《理化示教》等理化、生物教材几十种，另外还编有《哲学词典》，译有《德意志法律书》等。他体弱多病，“急于进取。尝自憾志行薄弱，遂更名‘志厚’。”他和王国维的关系甚好，因此，王国维曾用其名借作笔名撰文。²⁵

所译历史教科书中，以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最有名。该书版权页题名“格致学堂译、东文学社印”，初版时间为1899年。全书分总论、上古期二篇、中古期九篇。总论四章，分别为论本书之大旨、地势、人种、区分时代。上古期“汉族增势时代”二篇，第一篇“周以前”分三章，讨论太古、尧舜事迹、夏殷兴亡；第二篇“周”分九章，一周之勃兴与其制度，二周之盛衰、三汉族与诸外族关系及周时戎狄跋扈、四霸者，五自春秋末至战国初形势，六诸学兴起，七秦之勃兴，八合纵连衡，九秦之统一。中古期“汉族盛势时代”分九篇。第一篇“秦及西汉初叶”分六章，一始皇帝政策，二秦之亡，三汉楚之征，

²² 周传儒《王静安传略》，载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1997年，第281页。

²³ 神田喜一郎等《追忆王静安先生》，载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1997年，第389页。

²⁴ [日]狩野直喜《回忆王静安君》，载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1997年，第341~342页。

²⁵ 参见胡文辉《王国维的逸文及其自我表扬》，载《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5月6日。

四高祖政策，五自惠帝至景帝间形势，六武帝之治。第二篇“西汉经略外国”分五章，一南方诸国与西汉关系，二古朝鲜与西汉关系，三匈奴勃兴，四西域诸国沿革大略，五匈奴衰微。第三篇“西汉末世及东汉初叶”分三章，一自武帝至元帝间形势，二外戚之专权与王莽篡立，三汉室之再兴与东汉初叶。第四篇“佛教东渐”分四章，一释迦以前印度状况，二释迦出世与阿瑜陀耶时代，三大月氏之勃兴与佛教东渐，四东汉与西域诸国之关系。第五篇“东汉末世三国及西晋”分四章，一东汉末运，二东汉之亡与群雄割据，三三国鼎立与晋之一统，四晋室大乱。第六篇“五胡十六国及南北朝”分七章，一汉末以来塞外诸侯与汉族关系，二汉之勃兴与前后两赵兴亡，三东晋盛衰与前燕前秦之兴亡，四后魏之兴及南北两朝之分，五后魏与塞外诸国交涉及后魏之极盛，六后魏分裂及侯景之乱，七南北两朝末路与隋之一统。第七篇“隋及唐之初叶”分三章，一隋之盛率与群雄割据，二唐之勃兴，三太宗高宗之治及唐之制度。第八篇“唐经略外国”分九章，一自汉末至隋初朝鲜，二隋唐与朝鲜关系及百济高句丽之亡与新罗之一统，三突厥勃兴以前西域诸国形势，四突厥之兴亡及唐与突厥关系，五吐蕃印度之形势及其与唐关系，六唐兴中央亚细亚关系及大食之兴与波斯之亡，七唐之管辖属地法，八唐代东西互市，九诸外教之东渐与佛教兴隆。第九篇“唐中叶及末世”分七章，一武韦两氏内乱，二玄宗之治，三安禄山之乱，四唐中叶以后塞外诸国，五藩镇跋扈，六宦者专权，七唐之亡兴与群雄割据。

该书前有王国维所写的《东洋史要序》，文中称，他们的老师藤田丰八曾论述此书的大旨，“命国维书其端曰：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调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中散见之事实，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历史有二，有国史，有世界史。国史者，述关系于一国之事实；世界史者，述世界诸国历史上互相关系之事实，二者其界斠然，然其不可无系统，则一也。抑古来西洋各国，自为一历史团体，以为今日西洋之文化，我东洋诸国，亦自为一历史团体，以为东方数千年固有之文化，至二者相受相拒有密接之关系，不过最近世事耳。故欲为完全之世界史，今日尚不能，于是大別世界史为东洋史、西洋史二者，皆主研究历史上诸国相关系之事实，而与国史异其宗旨也。”这种东洋史的史学叙事形式上有一个区别于传统史书，包括近世所谓西洋史的地方，是在于“必自国史杂沓之事实中，取其影响及他国之事实，以说明现时之历史团体者也，抑我东方诸国相影响之事变，不胜枚举，如释迦生于印度，其教自支那、朝鲜、入日本，汉以攘匈奴而通西域。唐之盛也。西逾葱岭，南奄有交趾支那，以与波斯大食，海陆相通，元之成吉思汗兵威振于中央，及西方亚细亚，至其子孙，席卷支那朝鲜，余势及于日本，又如日本之倭寇、及丰臣秀吉，其关系于朝鲜及明之兴亡者不少。然则东方诸国，所以有现时之社会状态者，皆一一有其

所由然，不可不察也。故欲解释现时之社会状态，则研究东洋史，其要也。”王国维指出该书“于中国及塞外之事，多据中国正史，其印度及中央亚细亚之事多采自西书，虽间有一二歧误，然简而赅博而要，以视集合无系统之事实者，其高下得失，识者自能辨之，余尤愿读是书者，就历史上诸般之关系，以解释东方诸国现时之社会状态，使毋失为科学之研究，乃可贵耳。”²⁶

王国维所作的序言中有两点颇值得后人重视。一是这位新史学的提倡者强调了历史教科书要注重学科体系，“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没有“系统”的历史知识只是一些散乱的珍珠，不管多么美丽总无法有序地串联在一起。只有系统串联的珍珠，不管其数量多么巨大，也总能贯穿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知识只有按照一定的体系加以整合，才便于历史教学的需要。其次，王国维提出了“历史团体”的概念。从《东洋史要》的内容中我们不难看出，所谓“东洋”，主要是指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尽管主要讨论的历史事实大部分还是中国历史，但已经注意到“东洋诸国”，如西域、朝鲜等地区，即王国维所谓的“历史团体”，接近今日的“文化圈”的概念，与传统中国历史编写不注重系统的方法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指出这是“中国人第一部汉译日文书”，“樊炳清是中国最早翻译日本书籍的人。他并没有到日本留学；他的日文是从居留中国的日本人（藤田丰八）学来的。培养出第一个翻译日本书籍的人，这是东文学社的功绩。”²⁷东文学社版推出后，销路看好，以后还有1903年宝庆劝学会舍本。两湖文高等学堂1903年出版的陈庆年编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就是以《东洋史要》为蓝本的，陈庆年在该书序中称赞《东洋史要》“尤号佳构，所谓文不繁，事不散，义不隘者，盖皆得之”。该书也曾多次重印。²⁸傅斯年在留心观察中国史教科书的编写后指出：“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有变更其纲者。”²⁹王泛森在《戊戌前后思想资源的变化：以日本因素为例》一文也指出：《东洋史要》“这部书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期来分中国历史，第一期断至秦皇一统，称之为汉族缔造时代；第二期自秦皇一统至唐亡，称之为汉族极盛时代；第三期自五季至明亡，称之为汉族渐衰，蒙古族代兴时代；第四期括满清一代，称之为欧人东渐时代。而后来编写教科书的中国人便有意采取这种方法，下笔之际，纷纷以四期来分。”³⁰

《东洋史要》是一部篇章体的历史教科书，虽然没有正式设节，但每章中所分段落已

²⁶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王国维《东洋史要序》，载《东洋史要》，东文学社印本。

²⁷ [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第216~217页。

²⁸ 参见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64~265页。

²⁹ 傅斯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载《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1225页。

³⁰ 载《二十一世纪》1998年2月号，总第四十五期。

具有节的形式，初具章节体的雏形，构成了晚清史书体例进化从卷节体到章节体的重要一环。光绪辛丑年（1901年）樊炳清还与萨端合作译出日本小川银次郎的《西洋史要》，由金粟斋出版。该书已经明确有了章节的划分。全书分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和现世史四期，每期分若干章，每章又分若干节，如“中世史”第四章为“文运复兴”，下分三节。第一节“当是时，意大利诸市独繁盛，与海外交通。自希腊招学者教希腊语，讲退勒密、黑朴科迭司（Hippocrates）、幼克厉德（Euclid，今译欧几里得）之书，又学拉丁语，习希塞洛瓦其儿之文字，当时佩脱腊尔加（Retrarca）、波加西凹（Boccacio）最有才名，受当世优遇，凡研究古代文学者，称曰‘豪摩尼司脱’（Humanist）。”第二节“时始有活版印刷之法，一千四百三十六年（明正统元年）约翰固丁白耳克者（John Gutenbuig）于曼支（Mainz）创制活版，以布及棉制纸，印刷经典，由是豪摩尼司脱之学并古书，多付印广行于世。而民智日开矣。”第三节“又其美术，亦取希腊罗马之古制而折衷之，别成新式，号曰历奴意山司（Renaissance）。其时腊非洱（Raphael）可勒喀亚（Corregio）、美楷而安塞洛（Michael Angelo）皆美术家之最著者也。”³¹这一章节体西洋历史教科书为后来中国人西洋史教科书的编写，提供了重要的示范。

三、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的创办

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天南洋公学成立了译书院。同年五月初四和九月二十二日，盛宣怀曾先后代表译书院与日本总领事小田切³²签署了聘请陆军大尉稻村新六为翻译兵书顾问的合同。³³在聘用外籍译员的过程中，盛宣怀认识到：“译书宜兼通中外之学，而尤以专门为贵。”而像严复、伍光建一样的译书专门人才“实罕其匹”。而日本长岡护美在上海设立同文书馆以培养日本普通学生学习中文中学的理念，给予盛宣怀以极大的启发，“其取精用宏之意至深且远。”于是盛宣怀萌生了在南洋公学附设东文学堂的计划，他在1901年8月上旬所拟的《请专设东文学堂片》中写道：“长岡护美来游南洋公学，臣与考订一切，属其延订专门法学一人，又另聘兼通中学之教习来沪专设东文学堂，选取秀士数十名，专课东文东学。据称质地聪颖者，一二年后文字可通，举以译书，可期事半功倍。”³⁴东文学堂可能成立在1901年的秋天，有称附设在译书院之下，招收学生40名，专门学习日语。

³¹ 参见[日]小川银次郎著、樊炳清、萨端译《西洋史要》，陕西大成书局光绪辛丑版，第二十至二十一页。

³² 小田切万寿之助（1868—1935），日本领事官，银行家。1887年任天津领事馆随员。1902至1905年任驻上海总领事。1906年辞职进横滨正金银行，不久升为总裁。1913年为五国银行团的日本代表。

³³ 《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一），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56~59页；关于南洋公学译书院的详情可参见邹振环《江苏翻译出版史略》第五章第三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5~225页。

³⁴ 夏东元编著《盛宣怀年谱长编》，下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34~735页。

由张元济兼任主任，聘译书院翻译细田谦藏、稻村新六为教员。拟以两年为一期，培养留日学生和日文翻译。³⁵

上述一说，可能是将南洋公学译书院与东文学堂混为一谈了。关于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的材料目前很难寻觅。有一些回忆材料表明当时负责东文学堂的是罗振玉和南洋公学译书院的编校费念慈。罗振玉的孙子罗继祖在《庭闻忆略》中写道：1902年罗振玉因南洋公学总理沈曾植（子培）的“极力劝驾”，出任过东文学堂的监督，“东文设学，是祖父轻车熟路，多少已摸到一些规律。于是荐藤田剑峰任总教习。地址在虹口的谦吉里，见于武进费屺怀（念慈）致缪荃孙第一百四十七札中（《艺风堂友朋书札》上），费与沈都是盛所委嘱之人，沈主公学，费主译书，又都是祖父的旧交。”罗继祖保存着沈曾植致罗振玉的两通信，前者是从译书院暂挪两百元请刘季缨转交给罗振玉，用于公学的开支。后者因为东文学堂给拟所聘日本教员冈本的工资不高，自己不便直接向日本小田切商请，希望罗振玉能转达意思：“若冈（本）能以传学为怀，不靳靳于薪水，则大善矣。”罗振玉开办后还计划与钱恂一起去日本考察学制和编译二事。³⁶在为期两个月零八天的考察中，罗振玉会见了很多日本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视察了东京农科大学、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中学校、府立师范学校等，回国曾写过《扶桑两月记》一书。（光绪壬寅三月上海教育世界社石印本）早年创办东文学社和督办东文学堂的经历，使他深深认识到留学和外语学习对于一个青年人的重要性。他的大儿子罗福成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兽医科；第三个儿子罗福苌八岁就让他随藤田丰八博士学日语，罗继祖在《涉世琐记》中写道：“时家中堆积不少日本教科书，他课业之余能博览旁通，默记日本地图中诸道地名来考老师，博士有时竟不能答。于是趴在博士膝上，一一举出，竟不丧失，博士大为惊异。祖父知之，一到都门，就叫他从师学法语，到日本又学德语，又从神（木字旁）博士（亮三郎）学梵文。见到新出西夏文字书《番汉合时掌中珠》，和我父亲共学西夏文，为国人创始。后在病中还倚枕学英、俄文不辍。”³⁷

文中提及的“日本教员冈本”生平不详，可能就是编著《(新撰)日华会话编》的冈本经朝。冈本所编的《日华会话编》由其学生、曾经任职于南洋公学译书院的王鸿年翻译。该书有须藤壮一郎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刊本。全书分三编，第一编单语，分天文、地理、时令、人伦、人物、身体、衣服、饮食、器具、宫室、人事、舟车、兵器、货币、数目、植物、禽兽、虫鱼、外编、军语。第二编会话共25章，分为访问、失物、求医、声音、天气、酬应、买卖、眺望、疑心及担保、借物及返物、晚间奉托之事、饮食、诸艺、照相、

³⁵ 《交通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44页。

³⁶ 罗继祖《蜉寄留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9~30页。

³⁷ 罗继祖《蜉寄留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76页。

旅行、旧货铺子、谈话、喜事、商家之小伙计、书坊、访友不遇、欺骗、求画、饮宴、往伯父家。第三编会话分十八章，学算、定做西洋衣服、英学教授、邮便·电话·电讯、忘记、商议、告白及钱庄、寻物及招友、粗心、裁缝·钉书、新闻报、问路、酒馆、使役、移居、俭约·虚饰、运动·消化、税关用语。王鸿年，东瓯人，笔名鲁璠，早年随父亲游宦安徽。己亥（1899年）冬游学日本。后来可能与冈本一起担任过东文学堂的教学工作。1902年王鸿年本人还著有《日本语言文字指南》一书，山东京王惕齐、大西炼三郎印行。

38

南洋公学负责东文学堂的费念慈（1855——1905），字屺怀、筱亭，号西蠡，晚号艺风老人、归牧散人等，江苏武进人，光绪十五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在词馆与文廷式、江标齐名，工书，精鉴赏，兼长山水画。后因故遭弹劾去官，寄居苏州。³⁹期间在南洋公学译书院任校订，后负责东文学堂的日常事务。罗振玉还安排王国维担任该校的执事。⁴⁰可能帮助处理东文学堂的教务等事宜。后来罗振玉还藉口培养教员，劝王国维出国深造，“乃在南洋公学东文班官费留学生中补了静安名字。”⁴¹由于东文学堂“主事者和师资配备得力，学生又勤学，成绩很可观。”⁴²东文学堂前后持续了两年，1901年后来成为著名地质学家的章鸿钊，25岁那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南洋公学东文学堂，1903年秋东文学堂停办，他随罗振玉去广州襄办编辑教科书事务，1904年初被广东当局选拔派赴日本留学。⁴³印光大师也曾于1903年考取该校东文学堂学日文。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的学生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丁福保。

四、丁福保的日语教科书编译与日文医书的翻译

丁福保（1874——1952），字仲祐，号梅轩，别号畴隐居士，江苏无锡人。早年肄业于江阴南菁书院，受业于著名的数学家华蘅芳，后在实学堂任算学教员。1900年考入东吴大学，后因病随医学翻译家赵元益习医，后迁入江南制造局工艺学堂习化学。他在自述《医学与佛法》一文中称：1901年东文学堂的“投考者六百余，仅取四十名，余幸得录取。

³⁸ 《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书目录·明治期》，第5编“艺术·言语”，国立国会图书馆、纪伊国屋书店1994年。

³⁹ 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691页。

⁴⁰ 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页；参见张连科《王国维与罗振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8~69页。

⁴¹ 王国维赴日后进入了东京物理学校，“因为数学不好转入宏文书院。”参见龙峨精灵《观堂别传》，载蔡元培等著《未能忘却的忆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89页。

⁴² 罗继祖《蜉寄留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0页。

⁴³ 朱信泉主编《民国人物传》第七卷，中华书局1993年，第476页。

遂入学堂习日文。”⁴⁴在东文学堂里，他受到了较好的日文训练，同时他就开始尝试翻译日文医书，1901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有他译出的第一部通俗西医常识书《卫生学问答》。是一部较早输入中国的卫生学著作。两年后他就参与翻译日文版的《西洋通史》，并编辑了《广和文汉读法》一书。⁴⁵《广和文汉读法》，亦名“普通东文速成法”，题畴隐主人，即丁福保编著，1902年石印本。该书前有哀时客（梁启超）撰的《论学日本文之益》。作者声明“案此篇见戊戌年之某报，录诸简首以充序文云尔”。丁福保在《东文典问答》的“东文杂记”中对此书有过介绍：“余近辑《广和文汉读法》一书，共九十一节，从各种日本文典辑出。第一节至第十二节论九种字类；十三节至二十一节论动字之变化及用法；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论形容词，二十四节至四十七节论助动词、助词之用法及互相关系；四十八节至六十四节论文句之排列法及系统；六十五节至八十节论句与文之质性；八十一节论汉字下所附之假名；八十二节至九十节列和文汉译，导阅者译译书也。九十一节录富山房之话语一览表，列最普通之动词、形容词，虽初学亦能知何学为何段活用也。”全书开篇为“东语语法略说”，书后附录“新著绍介”以及“最新出版书广告”。《苏报》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十二日“新书介绍”称该书“使事学知各段语尾活用之妙，是书力求浅显，凡通汉文者读之，无不了解，读者当自知之。”

同年丁福保还编纂有《东文典问答》，屈蟠参校，文明书局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1902）初版，光绪三十二年七月订正第10版。该书是丁福保受吴稚晖鼓励，参照日本盐井正男、三上忠造等所著的文典编辑的。全书分十三章，一总论、二音韵、三名词、四代名词、五动词、六形容词、七助动词、八副词、九接续词、十感动词、十一助词、十二接词、十三文句的剖析。1902年文明书局初版载有日人茂原周辅所写 的日文序言。附录有“东文提要”和“东文杂记”。“东文提要”是将日文中紧要字句，录成四十款，作者认为倘能熟记，数日能有一小成。编者在附录中称自己曾因为友人“欲赴日本游学，拟先于上海尽三日之力，通日本文法、语法大略，因编‘东文提要’以授之”。⁴⁶这一段话对那些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日文的留学生颇有吸引力，该书因此也销路看好，该书初版在1902年初春，印刷了5000部，至当年秋天“销售已罄”。《苏报》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初十“新书介绍”中称该书“论动词、助动词、助词等各种变化及用法，皆浅显明白，以备独修之助，后附

⁴⁴ 丁福保《医学与佛法》，载《良友》第48期，转引自程德培等编《良友·人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64页。

⁴⁵ 丁福保《医学与佛法》，载《良友》第48期，转引自程德培等编《良友·人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63~64页。

⁴⁶ 《东文典问答》，丁福保编纂，文明书局1902年版附“东文提要”。

东文提要，述学东文速成之法，又附东文杂记，论学东文之门径及应买之书。”⁴⁷1905年冬该书经修正由文明书局再版，编入“普通教科问答全书”，1906年已出到订正10版。丁福保与同人组织的文明书局因此也获利多多，以后所推出三土忠造著《(中等)日本文典译释》三编销路颇好，该书局新书广告称：“原书系日本文学士三土忠造所著，为日本最通行本，其文法最为简要。此书先列原文，存原书之旧观；次列译义，以汉文译其意义；次列释要，解释和文之要字，条例井然，洵为独修之善本。”上海文明书局1907年12月还出版有日人和田万吉编、李征译、华文祺校的《中学日本文法教科书》，该书也多次再版，1932年仍有重印本。

在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短期的学习为丁福保一生的日语医书的翻译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从日文西医书中选译了河内龙若的《内科全书》、安藤重次郎等著的《内科学纲要》，另外还编了《医学提要》、《医学补习讲义》、《医学纲要》、《医学指南》等十余种书。1909年5月他受端方、盛宣怀之委托，赴日考察医院、医学校、传染病研究所，调查养育院、孤儿院等。身临异域的强烈感受，使丁福保认识到大规模翻译西方与日本医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近世东西各国医学之发达，如万马之腾骧，如百川之汇萃，磅礴浩瀚，骎骎乎随大西洋之潮流，渡黄海岸，注入东大陆，俾不才肆其雄心，穷其目力，运其广长之舌，大陈设而吸饮焉，岂非愉快事哉！”⁴⁸他的全面编译日文医书的计划就此展开。1910年他回国后即创办中西医学研究会，发行《中西医学报》，在上海梅白克路（今新昌路）开设医学书局，汇集有志于医学的同人，开始翻译日文医术。1910年印出25种，1911年印出23种，1912年印出7种，1913年印出8种，1914年印出11种。1914年前已出各类日文西医译作多达85种之多。《丁氏医学丛书》前期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1914年至1940年间则由上海医学书局初版或重版。我参考医学史家陈邦贤的分类，将《丁氏医学丛书》的85种分成解剖生理卫生学、病理学与诊断学、内科学与外科学、传染病学及免疫学、肺痨病学、妇科产科及儿科学药物学及处方学、细菌学、法医学、身心医学、其他等十一类。⁴⁹“丁氏医学丛书”中除了部分医书又华文祺、徐云、卢谦等译述外，大部分均由丁福保译出。该丛书大部分篇幅简短，行文流畅，颇受一般读者的欢迎，其中不少书多次重印，如足立宽的《育儿谈》，至1917年已发行了4版；《新内经》至1926年已印行了5版；《中西医方会通》至1929年已发行了6版；《实验却病法》至1930年已发行了6版；《看护学》至1933年已发行了8版；野津猛男的《汉法医典》，1929年2月初版，5年中发行了30版，平均每年6版。这套医学丛书，曾赴德国都郎万国卫生赛会和罗马万国卫生赛会参展，“各国医生无

⁴⁷ 吴相湘主编《苏报》，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第57页。

⁴⁸ 《丁氏医学丛书总序》，转引自《畴隐居士自订年谱》。

⁴⁹ 参见邹振环《江苏翻译出版史略》，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28~331页。

不惊叹其著述之渊博，咸以最优等之金牌奖励之。东西洋医书，列入两次之万国卫生赛会而得优等者，以吾国丁氏为最多。”⁵⁰

在近代西医输入史上，译述西医著作自 1851 年英国医生合信始，至 20 世纪初，其数量还是极为有限的，1902 年出版的徐维则的《增版东西学书录》，收录东西医书仅 50 种，加上解剖学、人类和心理学也只有近 70 种。而丁福保以一人之力，主译和主持编印的东西医书在数量上就超过了前半个世纪汉译医书的总和。不仅仅数量，在质量上，“丁氏医学丛书”所选择的原书，有不少是著名医学家的著作，比较充分和及时地反映了世界医学发展的最新成就，如《德国医学丛书》三编 15 种，便是选取德国当时著名医学家的权威著作编纂的。丁福保还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翻译日文西医书，鉴于当时肺结核患者甚多，丁福保译出了《肺痨病一夕谈》、《肺痨病预防法》、《肺痨病救护法》，介绍了该病症的一般病因、病理，讲述预防和诊治的手段。1910 年他还译出日本阿台杏平的《西洋按摩术》，被医学史家认为是西洋按摩术传入中国之先声。⁵¹

吴襄真在《丁氏医学丛书序》中指出：“丁氏已前之西医书已有二十余种，若一一与丁氏书互相对比，则无一可与丁氏书相颉颃者，丁氏书诚空前之巨著矣！”陈邦贤在《中国医学史》中还将丁福保所译之日文西医书与当年日本学者引进荷兰医书相比较，并予以极高的评价：“丁先生译述日本医学书籍，输入日本医学，犹之昔时日本前野良泽、杉田玄白等译述《和兰内景图谱》；桂川甫周、中川淳庵、源昌纲、岭春泰、石川云常、桐小正哲、大槻玄泽、宇田川玄随、森岛甫斋、司马江汉等译述和兰的《疡医新书》、《和兰局方》、《和兰药谱》、《海上备要方》、《和兰药选》、《八刺精要》、《五液精要》、《内科选要》、《六物新志》、《兰学阶梯》、《红毛杂话》等书，以输入和兰医学于日本，是同样的功绩；《日本医学史》对于前野、杉田、桂川等，推崇为兰学派创始，不没其革新医学开创之功，但是他们当时所译述的和学书籍，远不如丁先生所译述的多而且备。”⁵²

五、余言

甲午战后，朝野内外的中国人开始正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所取得的巨大成功，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人开始学习日语的高潮，这一“以日为师”的学习潮，是以日文学习的形式分别通过留学日本和在中国兴办东文学堂这两股渠道首先展开。这一时期国内兴办的东文学堂的特点是往往持续时间较短，师资零散和不稳定，一般缺乏较适宜的日语教科书。但这些短时间出现的东文学堂及其日语教育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一

⁵⁰ 《畴隐居士自订年谱》，第 22~32 页。

⁵¹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上海科技出版社 1987 年，第 99 页。

⁵² 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第 196~197 页。

定程度上在中国沿海和内地普及了日语，培养了一批日语人才。本文述及的王国维、沈紘、樊炳清、丁福保、章鴻钊等都是显例。

20世纪初中日之间的文化关系之紧密，远远超过我们目前的估计。遗憾的是这一时期不少东文学堂的面目至今仍模糊不清，其中不少中国的学生和老师，如沈紘、樊炳清、王鸿年、屈蟠等，生平资料都非常零碎，有的甚至语焉不详。而若干在这些新创设的东文学堂中任教的日本教习，如田冈佐代治、诸井六郎、船津辰一郎、长岡护美等；以及大批在中国学堂中服务的日本教习，如冈本等；一些参与编写过日语教科书的作者，如茂原周辅等，以及服务于中国出版机构的日本学者，如稻村新六等，由于这些人的主要活动在中国，因此他们的生平往往被日本研究者所忽略，而中国学者又碍于资料、语言等多种因素而无法进行深入的探讨。

事实上，历史叙述的宏大高楼正是靠这些微小的“砖瓦”累积起来的。这些日本教习与译员、中国学生的活动构成了近代中日文化关系史研究至关重要的环节。不能将这些日本文化人物在中国的活动加以清晰的复原，我们很难完成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由于这些人物的生平活动的复原要涉及到中日双方的浩瀚的文献，因此，特别需要中日双方学者在各自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共同合作，对有关教育、出版、经济、政治等多层领域的相关资料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与发掘，惟有如此，这一段历史的真相才能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